

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接受和研究(1985-2022)

李莹倩

(四川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1)

摘要:三十余年来,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在中国数度掀起了研究与阅读的热潮。从中国学者对昆德拉的热情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学者对作家作品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重心均不尽相同。经历了1980年代中期昆德拉研究者对作家文艺创作及小说主题思想的介绍与政治性误读阶段;1990年代中期以存在主题、性爱书写等研究为代表的过渡发展期,中国昆德拉研究于2000年代初迎来了繁荣发展期。但2010年代后,随着作家本人创作势头的下滑,昆德拉研究在中国遇冷。研究的疲软在导致困境的同时,也促使学者寻找突破口,确保昆德拉研究在变革中焕发活力。

关键词:米兰·昆德拉;中国;翻译;接受研究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2024)02-0106-10

收稿日期: 2024-01-13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四五”规划项目(SC21WY039):米兰·昆德拉的中国化阅读。

作者简介:李莹倩(1986-),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法语语言文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4.02.005

翻开米兰·昆德拉出版于法国的著作,人们会发现,他将自己漫长复杂的人生仅仅概括为两个阶段:出生与流亡。这简短到近乎自嘲的“自我介绍”却无法掩盖作家的智慧与文学的力量。乔恩·博伊森曾说:“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可不是那些让人泛泛而读的小说,它们值得被深挖细品,反复阅读,就像尼采提倡的‘反刍’一般。因为,这些作品中包罗了众多非一的主题思想与创作动机。”^①正是因其独特的智性魅力,米兰·昆德拉的作品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以来,数度掀起了研究其人其作的热潮,创造了属于中国的米兰·昆德拉学。

鉴于昆德拉在中国独特的传播历程,目前国内学界业已出现了以爬梳昆氏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成果为主题的论文,如安徽大学杨小梦的硕士论文《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赵谦的论文《国内米兰·昆德拉研究纵览与趋势》。上述两位学者对昆德拉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今后昆德拉研究的趋势进行了预判。尽管二位学者对昆德拉与中国之关系的思考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一定启示,但是仍存在观点转述、陈说罗列等不足之处。有鉴于此,我们试图通过对该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与现状做出较为客观的分析、总结与评述,从文学翻译与阐释的差异性中考析其总体性,聚焦文学与社会的回响,强化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中国立场与中国视角。

一、1985-1995:起步与误读阶段

中国对米兰·昆德拉其人其作的接受肇始于1980年代。1985年,李欧梵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南美和东欧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一文,向中国读者郑重介绍米兰·昆德拉,文中谈及昆德拉“轻”“重”相对立的小说之思与写作技巧,借昆氏的小说经验投射自身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希冀。蒋承俊与杨乐云分别于1988、1989年发表论文《米兰·昆德拉在捷克时的作为》《他开始为世界所瞩目——米兰·昆德拉小说初析》。作为国内系统研究捷克文学的专家,蒋承俊着重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米兰·昆德拉在捷克时的文艺创作,内容涉及诗歌、随笔、小说、戏剧。鉴于昆德拉对个人早期作品持

^①Jorn Boisen, *Une fois ne compte pas: Nihilisme et sens dans L'Insoutenable Légèreté de l'être de Milan Kundera*, Copenhagen: Museum Tusculanum Press, 2005, p. 18.

回避态度,并将其定性为“不成熟之作”“不成功之作”以及“应景之作”,^①蒋承俊文有助于中国学界全方位把握作家的创作脉络以及精神流变。杨乐云的文章分析了昆德拉小说的基本思想特点、重要主题以及“媚俗”概念,对中国读者系统性了解昆德拉小说理念起到了先驱指引作用。

中国学者还将目光投向域外之声,即作家访谈,力图通过翻译作者本人的讲述,为中国读者客观解读昆氏作品提供第一手资料。1991年,《当代外国文学》上首次刊登了露易丝·奥本赫姆(Lois Oppenheim)对昆德拉的访谈,译者段怀清。1992-1995年,《外国文学动态》《小说的智慧——认识米兰·昆德拉》《20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分别刊载了乔丹·埃尔格雷勃里(Jordan Elgrably)、菲利普·罗思(Philip Roth)、安托万·德·戈德马尔(Antoine de Gaudemar)对昆德拉的采访,译者杨乐云、李永辉和谭立德。上述访谈聚焦中欧概念、写作技巧、小说精神、流亡人生等关乎个人命运、历史际遇与事业发展的重要问题,不仅助力中国读者走进最真实的米兰·昆德拉,而且为后来者对昆作髓质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参照。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中国对昆德拉的接受呈现介绍与抵抗、解读与误读并存的特征。在1988年11月24日-25日召开的首届“东欧当代文学讨论会”上,一部分代表认为“昆德拉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我们在译介时应持谨慎态度”;另一部分代表认为:“昆德拉是个很有特色的作家……很值得我们广泛介绍。”^②两种矛盾对立的声音暗示中国的昆德拉研究独具特色。基于上述观点,中国学者在承认昆德拉“极权斗士”身份的同时,展开对昆德拉小说理念的小面积精挖掘,以回应作家本人的那句:“不,我是小说家”。

1987年,韩少功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③前言中罗列了昆作中包含的部分政治伤痕,并表示,有着相同曲折经历的中国读者没有理由忽视东欧文学。1991年,作家出版社特意在《玩笑》前加入“出版说明”,直言该“小说的思想观点有其偏颇之处”^④。同时,《玩笑》与《生活在别处》的中译者景凯旋也在译序中回溯了《玩笑》一书在捷克出版时,险些遭遇政治阉割的经历,并指出“政治”是昆德拉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景凯旋、徐乃建在《为了告别的聚会》的译序中指出小说男主角雅库布对待生活的行为实为一种怯懦的报复,而导致这场报复行径的根源在于主人公在母国遭遇的政治问题。在两位译者看来,远在中国的我们无疑会对雅库布的遭遇产生情感共鸣,因为我们经历过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⑤上述解读与误读不仅为中国读者了解米兰·昆德拉提供了可能,还进一步证实了泛政治化语境下解读昆德拉的合法性。

尽管此时中国读者对昆氏作品正处于政治化解读的阶段,但仍有学者明确指出:“昆德拉所揭露的意象形态,并不仅仅限于某一种社会和政治制度,而是一种超意识形态的思考。”^⑥本阶段十年,回归文学传统的昆德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作家小说主题与形式的全面介绍之上,呈现出概念提出、整体把握的面貌。

乐黛云在《复杂的交响乐》中着力区分了“现实”与“存在”这两个概念,认为“现实”并非昆德拉着墨的对象,因为“现实”为人类已经实现的可能性,即既成事实,而“存在”才是人类尚未实现的各种可能性,是昆德拉探究的场域。邵建率先将昆作定性为一场文艺“革命”,并指出昆德拉“革”出的道路即为“揭示和研究‘存在之谜’”的道路。诚然,邵建与乐黛云的研究内容略有重合,但邵建更为清晰地分辨出现实主义小说与昆氏存在小说写作目的间的异趋,即:现实主义“关注‘现实’的范畴,它的任务是反映;昆德拉所关注的是‘可能’的范畴,其任务是揭示。”^⑧艾晓明将作家小说观与作家个人经历相结合,意指

①Collectif, “Ne variteur-Remarques sur les éditions de l’auteur”, *La lettre de la Pléade*, 2011.

②高兴:《首届“东欧当代文学讨论会”在京召开》,《世界文学》1989年第1期。

③该书有1987年韩少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2003年许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两个译本。本文除直接引用外,统一用许本译名。

④[法]米兰·昆德拉:《玩笑》,景凯旋、景黎明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年,出版说明。

⑤[法]米兰·昆德拉:《为了告别的聚会》,景凯旋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3页。

⑥盛宁:《关于米兰·昆德拉的思考》,《世界文学》1993年第6期。

⑦⑧邵建:《人的可能性与文的可能性——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革命》,《文艺研究》1994年第6期。

人生的坎坷动荡孕育了作家艺术世界“独特的出发点与精神归宿”^①。

在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引入中国学界的初期,研究者对作家小说独特的“复调”形式亦有涉猎,成果从数量上看虽不丰硕,但内容决不单薄。李欧梵虽未明确将昆德拉的小说定义为“复调小说”,但作者已然提及了昆德拉本人良好的音乐修养及其小说的音乐形式。在李欧梵看来,作为可与马尔盖斯平起平坐的作家,昆德拉的作品虽属小说但恰似散文,“所以也不必受写实小说传统对时空次序的限制。”^②作为中国昆德拉研究第一人的李凤亮认为,复调小说理论并非昆德拉独创,其理论基石源自苏俄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然与巴氏不同,昆氏的复调小说概念强调的不是声音的多重性而是文体成分的多重性,故,昆德拉的复调小说理论为巴氏观点的升华。李凤亮进一步指出:“昆德拉倡导的不同文类在一部小说中的并举,不仅仅是对布罗赫的总结,而且在其小说创作上提出了一个超于前人的概念模式。”^③

综观 1985-1995 年阶段,尽管国内对外开放的程度有所欠缺,学界对昆德拉作品的态度也有所保留,但早期研究者仍在资料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准确地把握住了昆德拉文学作品的髓质,为今后昆德拉在中国的研究提供了强劲动力与重要文献。

二、1996-2000: 承上启下阶段

1992 年,自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再度掀起改革开放风潮。经济领域的开放之风吹向全国各地,也预示着中国将迎来一个更为灿烂的文化春天。人民大众对文学艺术的巨大需求与社会的开放氛围,确保了昆德拉作品的传播,也大大促进了中国学者对昆作研究向宽广与纵深的发展。1996-2000 阶段虽仅仅持续了四年时间,但在这一时期,中国研究者对昆德拉的认识已经由初步的认识与理解阶段,顺利过渡到了研究与评论阶段。同时,个别学者在其研究中所呈现出的独具中国体验的阅读视角,更是丰富了昆德拉在中国的接受与研究维度。

尽管对昆德拉作品的政治性解读已被视为理解他作品最陈腐的方式,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学者在政治一隅继续挖掘。以仵从巨为代表的学者认定“政治”是进入昆德拉小说世界的一大入口。但他并未囿于极权政治与官僚主义的范畴,而是从宏观角度去审视昆德拉笔下的政治,并将其视为“公众生活”的总和,认为“政治”可以涵盖“人与政治、人与社会、人与时代、人与历史等内容”。^④张志庆则明确指出,昆德拉的政治仅仅是作为人类存在的大背景而存在的,他将作家作品中所描绘的种种政治事件视为揭示人类境况的载体,进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即:载体的“可替换性”。^⑤在张志庆看来,昆德拉笔下的政治事件并非历史学意义上的政治事件,而是作为文学事件的政治事件,作品中出现的每一个政治事件均可以被替换成另一个事件,只要该事件是“通过对政治情形的思考,探索人的存在境况。”^⑥

可见,这一阶段中国文学研究者们已然从狭义的政治概念中抽离,转而研究政治作为存在的有效向度对小说主题阐发所起的作用。体现了中国学者对昆德拉作品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解读递进的过程。同时,由于社会风气的逐步开放,“性”已然不再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这一阶段的文学研究者们不会再像前人那样,在面对性描写时只得采取删除回避的态度,相反,他们有足够的自由将研究视点转向昆氏作品中的另一个显性特征:性爱书写。

仵从巨《性爱:昆德拉小说之门》指出,性爱是进入昆德拉小说的另一扇门,它暗藏了人类存在的诸多可能维度,如:“放纵的自由、压抑的约束、调谐的中庸、性的二元对立。”^⑦正是在这一系列的性的极端情

① 艾晓明:《昆德拉对存在疑问的深思》,《对话的灵光》,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 年,第 280 页。

② 李欧梵:《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南美和东欧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外国文学研究》1985 年第 4 期。

③ 李凤亮:《文体的复调与变奏——对米兰·昆德拉“复调小说”的一种解读》,《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3 期。

④ 仵从巨:《存在,昆德拉的出发与归宿》,《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 年第 4 期。

⑤⑥ 张志庆:《存在的探索者——米兰·昆德拉》,《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 年第 2 期。

⑦ 仵从巨:《性爱:昆德拉小说之门》,《当代外国文学》1997 年第 4 期,第 163 页。

境中，作家发掘出了人类存在最隐私奥秘的一面。胡海平认为昆德拉探讨“性爱”的态度是严肃的，但他呈现的手段是喜剧的。小说中一个个由性压抑与性渴望所引发的喜剧故事构成了昆德拉式的幽默，表现了人类存在的荒诞性。

米兰·昆德拉曾公开表示：“小说首先建立在几个基本的主题词之上。”^①中国学者已然注意到关键词作为“取之不竭的语义河泥”^②在昆德拉主题小说中所起的作用。敬文东率先指出了昆德拉在小说形式上的编码。他认为昆德拉的小说是以“词”的形式来塑造自我的，这个“词”就是存在的编码。作者通过研究，发现昆德拉分别从“离题”“叙述梦境”“哲学评论”“简化历史”“幽默”五方面对小说的编码进行了深刻改革，尽可能地扩展了对存在之可能性的勘探。作从巨亦对昆作中这一系列如筋骨般的词语大加肯定，认为“肉体、灵魂、青春、抒情、遗忘”^③这些词汇不仅支撑了小说人物，甚至可以支撑整部小说的完成。上述两位学者分别从小说形式与小说内容上对昆氏主题词进行了阐释，两人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后人理解存在编码对作家构筑主题之巢所起的作用，是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资料。

除却研究者们继续在小说主题、形式等文学范畴的精耕细作，在这一阶段，中国又迎来了对米兰·昆德拉的第二次误读。如果说中国读者对昆德拉的第一次误读源自中国与东欧相似的历史经验教训，那么第二次误读则源自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对“道”的追求与担当。1999年，余杰发表《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一文，该文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男主人公托马斯拒绝为政治犯请愿为批驳对象，进而围绕昆德拉与哈维尔谁更勇于承担展开讨论，从而引发了一场世纪之交的论争。此次论争持续时间虽不长，但论争内容超出了文学层面直抵社会、文化范畴，吸引了诸如崔卫平、陶东风、范若丁等学者的加入。可以说此次论争是中国昆德拉接受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再现了外国作家作品移植到中国语境下的变异过程。

综观第二阶段中国对昆德拉接受与研究的成果可以发现，国内对作家文学思想的研究逐步趋于系统、走向客观并呈现丰富的面貌，为未来中国昆德拉研究域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然不难看出，与第一阶段一样，该阶段的研究成果仍以论文为主。除却200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平、杨启宁撰写的《米兰·昆德拉：错位人生》一部专著，十几年间，对昆德拉人生、小说观、作品研究与出版情况的全面性、综合性研究尚为空白。

1992年，随着中国正式加入《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此前在中国出版的一系列米兰·昆德拉作品难逃“盗版”之名。然正所谓是挑战更是机遇，昆氏作品在中国的紧急叫停，标志着读者对更高质量译本的吁求，也预示着昆德拉研究在中国的又一高潮。

三、2001-2011：繁荣发展阶段

米兰·昆德拉曾公开表达自己对部分译者与译本的不满，他说“我最近注意到，个别亚洲国家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依据美国的译本来转译我的小说！个别中国出版商……假装没注意到法国在我文学创作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这岂不是一种无知？”^④

可见，昆德拉并非对自己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一无所知，作家口中的“美国译本”即指饱受作家本人诟病的英文译本，而国内第一批昆德拉译作均由上述译本转译而成。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玩笑》转译自迈克·亨利·海姆教授（Michael Henry Heim）翻译的英文版本；《生活在别处》《为了告别的聚会》《不朽》转译自彼得·库斯（Peter Kussi）的英文版本。1992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昆氏系列作品因版权问题不得不按下终止键，这也促使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1世纪初拉开了昆氏作品复译的帷幕。

①Milan Kundera, *Œuvre complète*, tome 2, Paris: Gallimard, 2011, p. 758.

②François Ricard, *Le dernier après-midi d'Agnès*, Paris: Gallimard, 2003, p. 62.

③作从巨：《“存在”之思铸就的形式——论昆德拉小说形式的独特性》，《文艺研究》1996年第5期。

④Milan Kundera, “La francophobie, ça existe !”, *Le Monde*, 1993-09-24 (04).

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购买昆德拉十三本著作的版权，并集结国内以许钧、余中先、马振骋等为代表的顶尖翻译团队对昆德拉作品进行复译，并与作家本人发表联合声明，以确保译作的合法性与忠实性。截止2014年，昆德拉的十一部小说（《玩笑》《好笑的爱》《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不朽》《慢》《身份》《无知》《庆祝无意义》）；四部文艺随笔集（《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帷幕》《相遇》）；一部戏剧（《雅克和他的主人》）共计十六部著作均由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完毕，标志着昆德拉作品在中国合法且完整出版的胜利，也促发了昆德拉在中国接受与研究的第三次高潮。

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2001-2011年为时间区间、“米兰·昆德拉”为关键词，在社科目录下搜索，共得到968条结果。其中学术期刊论文486篇、学位论文96篇、会议论文5篇、报纸文章42篇。经筛选，保留以米兰·昆德拉为研究本体的篇目，得到有效结果327条，分类统计见下表：

论文类别	论文分类统计数				合计	总计
米兰·昆德拉作品 及其小说形式 与理论研究	作品 分析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53	146	264	327
		其他作品研究	78			
		综论	25			
	文艺 理论	存在观	36	91		
		幽默观	11			
		综论与其他	44			
	作品 形式	复调	26	27		
		词典体	1			
米兰·昆德拉 与中国	接受研究			12	63	
	比较 研究	王小波	5	28		
		其他	23			
	影响 研究	韩少功	5	6		
		陈忠实	1			
	翻译研究			17		

（一）米兰·昆德拉作品及其小说形式与理论研究

由上表可知，中国学界对昆德拉作品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上。作为第一部进入中国的昆德拉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已然成为昆氏在中国的名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作为昆德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理应获得中国学界的特别关照，但若将视野局限在一部作品之上，就会陷入理解作家的偏执与局限中，忽视作家对人类命运的多维关照。此外，这一阶段，学者们将更多的心力投入到了对作家作品的具体阐释之上，对昆氏文艺思想的研究略有松懈。然作为一个拥有独创小说理论的作家，昆氏的小说实践势必在其理论的指导之下完成。若想揭示“昆德拉何以绘制人类存在之图”这一核心问题，唯有加大对作家文艺理论的钻研力度。

1. 关于米兰·昆德拉作品的研究

这一阶段，学界对《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小说“存在观”的解读以及对小说个体人物的解读方面。

兰兴伟《对存在的沉重感悟——〈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主题解读》指出小说主旨是展现“不同制度和情景中知识分子存在的多种可能性”，描绘了存在之境况、存在之复杂性与可能性。^① 谢占杰《探求生命伦理之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别解》，认为研究者尚未展开对存在之伦理维度的探讨，他匠心独运，

^① 兰兴伟：《对存在的沉重感悟——〈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主题解读》，张义编：《外国语文论丛》第1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4页。

对作品中表现出的人与上帝、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借助托马斯、特蕾莎的行为,揭示昆氏存在观饱含的慈爱、仁义与同情之心,为该作镀上了一层生命伦理之光。

欧翔英、刘爽通过分析特蕾莎、萨宾娜和阿涅丝几位女性人物远离政治,接近艺术,抛却浮躁,迷恋孤独的反媚俗形象,指出女性作为昆氏存在观的载体,其主导的价值观可助力人类回归“存在的本源”^①,获得“真正独特的生命存在”^②。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学界对《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关注度居昆氏所有作品之首,但高质量高层次的研究成果寥寥。据笔者统计,在五十三篇针对该作的研究成果中,仅有四篇发表在诸如《四川大学学报》《国外理论动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等核心期刊上。相反,个别未受到学者一致关注的作家作品反为部分学者提供了研究灵感,提出了颇具学术价值的观点。如何峰以《生活在别处》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男主人公雅罗米尔如何在性爱生活与政治斗争中从“此处”走向“别处”,揭示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深刻错位”。^③张弛通过对《生活在别处》叙事结构的分析,探索了小说主题,即:“青春、诗歌与革命”。^④袁筱一认为《无知》系昆德拉从“出发写到了回归”的作品。^⑤而许钧从《无知》的情节结构与叙述方式出发,分析了流亡者在面对“回归之梦”时的难以抉择,揭示“回归之不可能”。^⑥

总体上看,中国学界对昆德拉个体作品的研究呈现出不平衡的局面,主要偏重于昆氏在中国声名远播的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此外《生活在别处》作为一部充满抒情诗意的小说,因其传达的对崇高的过激追求却导致可耻堕落的文学思考与既有价值观相悖,而受到了个别中国学者的关注。然值得注意的是,自《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后,昆德拉文学创作的哲理化倾向愈来愈重。作家作品的哲理思辨意蕴本应得到学界的关注,但从统计结果来看,昆德拉的这一类作品《慢》《身份》等遭到了学界怠慢。

2. 关于昆氏小说形式与理论的研究

数据显示,国内学者对昆德拉小说的复调形式给予了充分关注。以李凤亮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对音乐与作家的关系、复调小说的起源、复调小说的内涵、昆氏复调小说的特征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阐释。李凤亮认为音乐对昆德拉的影响非同小可,昆德拉常在文论中申述小说与音乐联姻的重要性且常借助小说发表自己对音乐的沉思,故音乐乃“昆德拉关于小说结构的艺术逻辑”。^⑦复调小说乃昆德拉针对小说形式多元发展所提出的一种“实验思路”。^⑧“文体复调”系昆德拉复调小说体系中的显性特征,亦是作家超越前人的过人之处。^⑨曾宪文在李凤亮的基础上,提炼出了昆德拉复调小说的四大特征,即:“文体的复调、线索的复调、人物的复调、时间的复调。”^⑩

对作家作品形式的厘清有助于学界对昆德拉形而下的认识上升到形而上的理解。在此十年间,学界在关注“复调小说”的同时也将注意力转向了对昆作中某些深奥哲学命题的思考。从统计结果看,中国学界对昆氏文学理论中的三个响词极为在意:存在、媚俗、幽默。

揭示“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系昆德拉小说的起点与归宿,故我国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内容最为深入。2002年,李凤亮在《小说:关于存在的诗性沉思——米兰·昆德拉小说存在关键词

①欧翔英:《从注视到聆听——昆德拉与当代美学转向》,《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②刘爽:《流失的轻与固着的重:米兰·昆德拉小说的女性形象》,《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0期。

③何峰:《“别处”和“此处”的深刻错位——读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当代外国文学》2001年第1期。

④张弛:《昆德拉〈生活在别处〉的叙事分析》,《当代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

⑤袁筱一:《跨越不知边界的回归》,《读书》2004年第10期。

⑥许钧:《流亡之梦与回归之幻——论昆德拉的新作〈无知〉》,《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10期。

⑦李凤亮:《思想与音乐的交响——米兰·昆德拉小说的结构隐喻》,《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⑧李凤亮:《复调:音乐术语与小说观念》,《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

⑨李凤亮:《文体的复调与变奏——对米兰·昆德拉“复调小说”的一种解读》,《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⑩曾宪文:《米兰·昆德拉小说复调艺术的具体内涵》,《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解读》中就指出：“关于存在诗性沉思”系昆德拉区别于纯粹哲学思辨与讲述描写性小说的要点。在李凤亮看来，作为小说家的昆德拉和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思考截然不同。昆氏的小说关注的不是哲学式的推理和论证而是通过具体的人物的具体情况来“传达某些存在的情境”。^①那么，如何完成“敞亮存在”这一昆德拉所张扬的小说使命呢？胡志明与张弛认为，昆德拉借助“政治”“性”以及“小说的自主性”三方面拷问了人类存在的具体境况。胡志明指出，昆德拉为了澄明形而上的“存在”问题，特意选取“政治”与“性”两个主题对个体生命的存在加以描写。他认为“昆德拉……总是把性与政治放在一起，通过它们互为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复杂关系，把人的‘存在的被遗忘’的状况展示得淋漓尽致。”^②张弛认为，为发现人类存在的各个方面，昆德拉还借助小说形式的自主性，通过书写离奇的故事与任意一种文学形式，让小说对人类的存在“有所发现”。^③

媚俗与幽默也是昆德拉小说理论的特色。涂险峰在《从昆德拉的“第二滴眼泪到现代人的信仰姿态”》中将“媚俗”比作人类流下的“第二滴眼泪”。作者指出，“第二滴眼泪”的本质是一种人类用以标榜自我的姿态性情感，而昆德拉对这样一种姿态性情感的讽刺就是为了维护情感的真实纯粹性。^④李凤亮对昆德拉的幽默观亦颇为关注。李凤亮在《论米兰·昆德拉的幽默小说观》中发掘出了昆式幽默的精髓，即：根植于世界荒谬性中的幽默远非快乐的笑所带来的轻松愉快，而是含泪的笑所传达的自嘲与反讽。^⑤

总体来看，中国学界针对昆德拉小说形式与理论的研究呈现出内容充实、观点新颖的特点。学者们全面、细致、深入的研究昭示着中国的米兰·昆德拉研究已经走向成熟。

（二）米兰·昆德拉与中国

昆德拉缘何进入中国？翻译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正是翻译，让米兰·昆德拉得以在中国语境内生根发芽。2002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发起的昆氏作品在中国的复译，让原本已经被历史尘封的昆德拉中国译事第一次站在聚光灯下。在本阶段，文学研究界涌现出了多篇关于作家作品翻译的研究成果，内容涵盖：《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汉译梳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初译者韩少功与复译者许钧的访谈、昆德拉初译者与复译者的对话、对韩译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研究、对该作初译本出版方的访谈以及记者相关报道。

对昆氏著作汉译的梳理与研究均集中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上，原因有二：从译者能力方面看，初译本译者韩少功作为寻根文学的摇旗者，其本人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力及其高超的文学修养，不仅确保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生俱来的优越性，也让翻译过程有迹可循。而复译者许钧四十余年的翻译生涯为他积累了数百万字的译文，坚实的翻译实践与理论基础保证了复译本的忠实可靠。从译者选择来看，韩少功于1980年代中期与姐姐韩刚合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一敢为天下先的决定彻底拉开昆德拉在中国热读的帷幕。而许钧作为后来者，他顶住珠玉在前的压力，为读者呈现了原汁原味的昆德拉。两位译者兼具人文学者的情怀与担当，成就了中国翻译史上的一段佳话。

基于上述原因，赵稀方、宋炳辉、高方等知名学者分别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韩译与许译本的忠实程度进行了评析。赵稀方认为“米兰·昆德拉在中国走红的后面，掩藏着他的作品被肆意篡改的悲惨事实”。韩少功姐弟翻译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译本发行量高达十几万册，但该译本却充满了错误。不仅如此，韩氏姐弟还选取饱受昆德拉诟病的英译本转译，可谓错上加错。^⑥高方在《文学生命的继承与拓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汉译简评》中从翻译选择、翻译观与翻译原则三个层面考量了韩译本与许译本的差异，并认为两位译者正是在各自翻译思想的指导下，为读者奉上了风貌不同的译作：韩译本“多色

①李凤亮：《遮蔽与敞亮：“思想”道路上的小说》，《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②胡志明：《智慧与恐惧：两种“存在的图”》，《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③张弛：《小说何所是？小说当何为——昆德拉小说诗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6期。

④涂险峰：《从昆德拉的“第二滴眼泪”到现代人的信仰姿态》，《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⑤李凤亮：《论米兰·昆德拉的幽默小说观》，《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⑥赵稀方：《被改写的昆德拉》，《东方翻译》2011年第2期。

彩,导向感性世界”,许译本“冷峻,导向理性世界。”^①故宋炳辉在《韩少功的翻译和我们的昆德拉》中指出原作者对译本的认可也无法作为译本忠实性的担保。在宋炳辉看来,文学翻译是在“忠实与自由的两难处境的夹缝中展开的,”因此,原文作者对绝对忠实的苛求就是一种文学翻译的乌托邦狂想。^②这一观点也正好印证了宋文题目所暗含的意蕴:在中国有属于“我们的昆德拉”。

笔者认为,昆德拉在中国的翻译研究独具特色。因为国内针对《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初译者与复译者的访谈以及二位译者间的对谈不仅为“昆德拉在中国”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同时因二位译者在同一时空的相遇,明确了“谁来译”“译什么”“怎么译”等关乎译文生命延续的核心问题,并从译者角度探明了不同译本间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2003年,韩少功在接受《深圳商报》采访时表示译作是原作的再生,故而“我们的译本当然只能给出一个汉语语境中的昆德拉,译者理解和表达中的昆德拉”。^③从上述研究可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初次进入中国时曾遭遇过删改。韩少功也承认彼时为了让译本通过出版审查,自己的译文“只能说大体完整”。^④许钧认为,韩译本因时代限制而导致的翻译折中情有可原。因为“他翻译的时候,确实有很多忌讳的词需要避免”。^⑤尽管如此,在许钧看来删节仍是恐怖的。因为翻译归根结底就是译者将原作者的声音以另一种方式传达给读者。为了避免读者的误读,捍卫译作的完整性与真实性便是译者的任务。

除此之外,各类报纸新闻报道也成为昆德拉在中国的重要佐证。如2003年4月16日刊载在《中华读书报》上的文章《上海译文社明媒正娶昆德拉作品》、2003年5月1日刊载在《文学报》上的文章《走进更真实的昆德拉》以及2009年2月4日刊载在《中华读书报》上的文章《白冰的出版人生》。上述报道从侧面考察了译者、出版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完满了昆德拉的中国之旅。

在这一阶段,我国学者亦从接受、影响与比较之维探究昆德拉与中国的关系。从2002年起,便有研究人员开始关注昆德拉对王小波、陈忠实等人创作的影响,并且尝试将昆德拉与鲁迅、王蒙及“新写实”小说进行比较分析。然令人遗憾的是,较之昆氏作品在中国的翻译研究,现有成果均局限于泛泛而谈。事实上,陈忠实早就明确表示自己阅读昆德拉时,收获了甚为重大的启示,那就是“关于生活体验与生命体验的切实理解”。^⑥由此可见,从比较与影响角度去研究昆德拉与中国关系不仅可行且具有巨大潜力。现有研究基础的薄弱恰似一把双刃剑,尽管无前人经验可以借鉴,但却为中国昆德拉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新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昆氏作品复译工作的逐步完善,学界对昆德拉的研究也以更为宏大的形式展开,开始出现学者以专著的形式对昆氏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2002年,书海出版社出版高兴专著《欲望玫瑰》;200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李平、杨启宁合著的《米兰·昆德拉:错位人生》;2003年,西冷印社出版彭少建撰写的《诗意的冥思:米兰·昆德拉小说解读》;2003年,李凤亮的《沉思与怀想》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华夏出版社出版陈从巨的《叩问存在——米兰·昆德拉的世界》;2005年高兴的《米兰·昆德拉传》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20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李凤亮的《诗·思·史:冲突与融合》;2009年,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彭少建的《米兰·昆德拉小说:探索生命存在的艺术哲学》;2011年,张红翠的《流亡与回归——论米兰·昆德拉小说叙事的内在结构与精神走向》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书籍不仅丰满了昆德拉在中国的研究成果,亦逐步使昆德拉走向经典化。

①高方:《文学生命的继承与拓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汉译简评》,《中国翻译》2004年第2期。

②宋炳辉:《韩少功的翻译与我们的昆德拉》,《东方翻译》2009年第6期。

③《韩少功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翻译》,《深圳商报》2003年3月15日。

④吴铭:《“生命之轻”的对话——作家韩少功和翻译家许钧教授专访》,《社会科学报》2003年9月18日第3版。

⑤朱竞:《生命之“轻”与翻译之“重”——许钧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06年第3期。

⑥陈忠实:《记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四、2012-2022：发展疲软阶段

在本世纪之交，李凤亮曾经发表一篇题为《昆德拉：走在“遗忘”的途中》的文章。在文中，作者记述了昆德拉与诺贝尔文学奖一次次擦肩而过的遗憾经历。李凤亮的文章似是来自 21 世纪初的谶语，预估了中国昆德拉研究在这一时期的疲软状态。

在此阶段，已有少部分学者尝试探讨昆德拉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原因。如叶竹盛在《昆德拉为什么得不到诺奖？》中就认为昆德拉兼具“政治流亡者”“文体创新者”“极权抨击者”“人类命运关怀者”等各种身份，是一个拿诺奖的热门选手。然在多重敏感身份的加持下，昆德拉为何无缘诺奖呢？在叶竹盛看来，作家作品主题的单调、作家创作力的减退、作家文学观念的陈旧均系昆德拉得不到诺奖的原因。吴俊在文中更是戏称昆德拉为诺奖的“陪跑者”。在吴俊笔下，昆德拉是代表“过时了的政治”^①的昆德拉，故诺奖在昆德拉的另一边。王炜历数了诸多诺奖的资深陪跑者并认为昆氏不被诺奖评委青睐的原因在于其作不具备“理想主义的色彩”。^②

上述成果虽仅限于论述昆德拉与诺贝尔文学奖之间的关系，但却从侧面反映出 2012-2022 年间“昆氏研究在中国”所存在的核心问题，那就是：在部分研究者口中，昆氏小说略显褪色的文学底色，不仅拉长了作家与诺奖间的距离，也拉长了作家与中国研究者间的距离。

经笔者统计，2012-2022 年间，针对昆德拉其人其作的发文量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在这十年间，以昆德拉为研究主题发表的期刊论文共计 232 篇，其中仅有 41 篇发表在核心学术期刊上。尽管在这一阶段，论文发表量大不如前三个阶段，但仍有个别学者从新视野对昆德拉展开研究，提出了可圈可点的看法。例如，在 2010 年《人民文学》启动非虚构写作计划，倡导重建文学与时代、读者和社会紧密联系的“真实”写作思潮的影响下，2016 年，刘春勇在《昆德拉·鲁迅·非虚构写作》中指出昆德拉早就在其文学之思中提出“向小说的年代的告别”，即“向现代小说的告别”“走出这一幻想与梦境的写作模式”。^③这些成果的出现，不仅体现了我国研究者对推陈出新所做出的努力，也彰显了外国文学在中国语境中的移植与融合。

这一阶段，对昆德拉作品的译介与出版研究相对系统化。许方认为昆德拉作品在母国被禁的命运与出路的艰难找寻让作家本人坚决拒绝译者对自己作品的整体编译。故而，昆德拉要求译者在“作品风格”“原文比喻”“原文词汇”“原文重复”等三方面保证绝对忠实。^④昆氏作品在中国的第一次译介的可信度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译者选择英译本进行转译；二是早期译者将文学翻译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相结合。上述两点问题会导致译作与作家追求的“无限接近原作”这一目标背道而驰。^⑤为修正初译本中的硬伤，新世纪初的上海译文选取获得作家本人认可的法文本进行翻译，同时集结了国内一流法文翻译家组成团队，积极修订前人漏误，为读者重新认识昆德拉提供了可能。

昆氏作品得以在 21 世纪初重译且获得销售佳绩，离不开作者与译者及出版社的多方配合。许方认为，正是基于“信任”与“求真”^⑥的四字原则，昆德拉与中国译者及中国出版社齐心协力，保证了昆氏中译本的质量。鉴于文学的开疆扩土需要传播媒介，故而昆作复译本的传播路径也是许方研究的重点。许方在《昆德拉作品新译在中国传播的传统媒介路径》中，探讨了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文学研究者所撰书评对新译本传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并认为文学译介的研究需要扩开思路：不仅要关注译本如何通过媒体打开销路市场，同时也不能忽视读者对译本传播所立下的汗马功劳。因为“在翻译与传播的整个过程中，读者也

①吴俊：《“陪跑者”昆德拉的文学》，《中学语文教学》2015 年第 11 期。

②王炜：《诺贝尔文学奖的陪跑者》，《创作评谭》2019 年第 1 期。

③刘春勇：《昆德拉·鲁迅·非虚构写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 年第 7 期。

④许方：《试论昆德拉独特的创作之路》，《外语学刊》2018 年第 3 期。

⑤许方：《昆德拉在中国的译介历程》，《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 年第 9 期。

⑥许方：《昆德拉作品汉译中作者、出版者与译者的合力》，《中国翻译》2018 年第 2 期。

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译介活动中去”。^① 许方的五篇文章，不仅宏观再现了昆德拉在中国译介的全过程，同时进入细节，揭示文学生命何以在作者、译者、读者、出版者的四维关照下得以继承与拓展。

与此同时，以“昆德拉”为主题的专著仍在持续出版。201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蔡俊的《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传播与变异》；2014年，曾宪文专著《终极悖论：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世界》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2019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昆德拉小说中的“身份”问题研究》，作者为周莹；2020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许方撰写的《昆德拉在中国的翻译、接受与阐释研究》。所列专著完整再现了昆德拉的人生轨迹，注重文本细读与资料累积，采取逐个击破的方式对昆氏全系作品中所蕴含的“存在观”及以“幽默”与“复调”为代表的叙事结构进行深层解读。同时，紧扣昆氏戏剧人生与其小说之关联，关注昆氏作品中所反映的“流亡”、“回归”、“身份”等问题。最终，从单纯的、静态的昆德拉小说世界进入到多元的、动态的昆德拉与中国的关系，即：以历史为轴线，厘清昆氏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问题。

结语

三十余年来，中国学者在昆德拉研究上用力颇多，成绩斐然，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和文学敏感度等方面，仍存在缺憾。^② 为了冲破现有研究藩篱，我们理应思考全新研究路向。张容《米兰·昆德拉存在观对我国践行“以人为本”思想的启示》：“昆德拉的存在观富有哲理性，对其进行深入解构，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践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③ 综观国内三十余年针对昆氏的研究，可以发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昆德拉”。“米兰·昆德拉在中国”就其本质而言，已经演化为“中国化的米兰·昆德拉”。故，张容一文为昆德拉在中国语境中焕发新生提出了解决方案，即：将外国文学解读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与话语需求相关联，充分探讨昆德拉小说之思与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之间的关联，促使外国文学成为适应中国社会人文思潮的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唯有此，中国文学研究者们才能避免昆德拉这样一位具有世界性视野的作家走在被遗忘的途中。

The Reception and Study of Milan Kundera in China (1985-2022)

LI Ying-q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1, China)

Abstract: Milan Kundera's works have been studied and read in great intere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30 years. It can be found from Chinese scholars' enthusiasm for Kundera's works that the scholars' research direction and focus are different. In the mid-1980s, Kundera's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and the themes of his novels were introduced, and he was misinterpreted politically. In the mid-1990s, the research shifted to existential themes and sex writing. In the early 2000s, Kundera studies flourished in China, with many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and scholars who published books and gave talks on Kundera. However, after the 2010s, as Kundera's creative momentum declined, Kundera studies in China cooled. This weakness has led to difficulties, but it has also prompted the scholars to seek new breakthroughs to revitalize Kundera studies.

Keywords: Milan Kundera; China; translation; reception studies

[责任编辑 唐音]

①许方：《文学译介中译者与读者的互动——以昆德拉作品的汉译为例》，《外语教学》2018年第1期。

②李凤亮：《诗·思·史：冲突与融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③张容：《米兰·昆德拉存在观对我国践行“以人为本”思想的启示》，《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